

卡特科夫文学批评的伦理选择：以《罪与罚》的出版争论为中心

Ethical Choice in Mikhail Katkov's Literary Criticism: Focused on the Publication Controversy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朱建刚 (Zhu Jiangang)

内容摘要：19世纪俄国政论家、思想家米哈伊尔·卡特科夫的文学批评不但奠定了他作为保守主义文学批评之首的伦理身份，也使得俄国文学批评中的斯拉夫伦理价值观显现无遗。卡特科夫对《罪与罚》创作过程的深度介入，体现了他的文学批评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舞文弄墨之举，而是包含了引导社会思潮、塑造良好风气乃至捍卫国家利益的用意在内。这一用意既是他身为杂志主编的伦理身份所决定，同时也与他对文学创作的伦理本质认识有关。卡特科夫文学批评中的伦理观建立在俄罗斯东正教信仰基础之上，一方面体现了19世纪俄国文学中艺术与现实的冲突主题，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斯拉夫伦理价值观的意义。这一点通常为此前的研究者所忽略。

关键词：卡特科夫；文学批评；伦理身份；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朱建刚，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杰出特聘教授，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思想史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俄国导报》研究（1856-1906）”【项目批号：20AWW004】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Ethical Choice in Mikhail Katkov's Literary Criticism: Centered on the Publication Controversy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Abstract: The literary criticism of the famous 19th-century Russian political commentator and thinker Mikhail Katkov not only established his ethical identity as the head of conservative literary criticism, but also made the Slavic ethical values of Russian literary criticism evident. The depth of Katkov's involvement in the creation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shows that his literary criticism was not just an exercise in the usual sense of the word, but that it included the intention of guiding social thinking, shaping good morals and even defend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state. This intention is not only determined by his ethical status as editor-in-chief of the magazine, but also related to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ethical nature of

literary creation. Based on Russian Orthodox beliefs, the ethics of Katkov's literary criticism reflects the theme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art and real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 as well as the significance of Slavic ethical values. This is a point that has often been ignored by previous researchers.

Keywords: Mikhail Katkov;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identity; ethical choice

Author: Zhu Jiangang, Ph. D., is the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31, China), PhD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of ideas (Email: 58426960@qq.com).

在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史上，卡特科夫（Катков М.Н., 1818-1887）并非以文学批评家知名。但他关于文学批评的几篇文章却因为他身兼《莫斯科消息》和《俄国导报》主编的伦理身份而影响深远，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可与别车杜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批评相抗衡的保守主义文学批评。应该说，别车杜的文学批评同样高度关注现实，他们所秉持的思想资源来自于西欧启蒙思想，批判矛头直指俄国现实，他们的启蒙思想为推动俄国社会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点在苏联时期已有公论，研究成果众多。相对而言，卡特科夫的保守主义批评却因为意识形态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乏人问津。在笔者看来，卡特科夫文学批评的最大特点就是其中所蕴含的斯拉夫文学伦理观。正是这一因素的存在，使得他能在1860年代虚无主义思潮横扫一切之际挺身而出，以东正教精神为基础，以手边一报一刊为阵地，宣扬一种积极的、肯定的¹文学批评观。

然而，正是由于卡特科夫对俄国文化传统，尤其是东正教价值观念的捍卫，对沙皇威权政治体制的维护，他的文学批评观自形成之日起便屡遭非议，到苏联时代后，他的名字更是从俄国文学批评史中被剔除，他的文学批评遗产中所包含的斯拉夫文学伦理观也无从谈起。本文拟以卡特科夫文集为依据，结合他对《罪与罚》创作的干涉实践²，对他的文学批评及其中所蕴含

1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е”一词在俄语中既有“积极”，又有“肯定”的意思，通常评论家将之与别林斯基等人代表的 отрицательное（否定的）文学批评相对应。如著名根基派评论家格里戈里耶夫（Григорьев Ап.А.）就有《别林斯基与文学中的否定观》（1861）一文论及这一概念。大致来说，否定是基于西方启蒙思想基础上对俄国现实和传统的否定，与之针锋相对的是立足于俄国文化传统及东正教基础之上对现实的肯定。由此衍生出来的便是思想上的激进与保守之分、革命与改良之别。身处21世纪的我们或许依然无法对这两种思潮做一个简单的好坏评价，只能尽量揭示此前较少为人关注的保守、改良思潮，以求教于方家。

2 对于这个问题，即便是以材料丰富而著称的美国陀学大家约瑟夫·弗兰克也在他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中坦言：“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对此知之甚少。”参见约瑟夫·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传：非凡的年代，1865-1871》，戴大洪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24。

的斯拉夫文学伦理观做初步的挖掘，以进一步多角度多层次地完善对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的认识。

一、关于《罪与罚》的出版争论

人都是社会的人，欲谈文学批评伦理观，必先谈伦理身份。“人的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人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聂珍钊 263）。卡特科夫身为《莫斯科消息》和《俄国导报》主编，这一伦理身份是他几经奋斗之后才获得的。作为一位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卡特科夫体验过贫困，也获得了成功。他之所以没有像别车杜那样选择成为启蒙思想的激进领袖，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他对俄国传统文化的信念，对俄国现实的深刻把握。社会需要在稳定中发展，这一观念使卡特科夫成了旁人眼里维护现行体制的代言人。但也正是这一观念决定了他对于当时社会舆论的引导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卡特科夫不止一次地强调：“杂志不是文集。杂志的主要优点在于它有一个统一的倾向。编辑部的责任就在于在杂志中到处体现这种倾向”（*Катков Объяснение* 148）。从《俄国导报》的发稿情况来看，“这种倾向”就是强调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捍卫俄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位作家，作家的伦理身份决定了一方面要通过书写人物的喜怒哀乐，来吸引乃至感动读者，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对人物的塑造从责任、义务和道德等价值方面对人的身份进行确认，进而将人与野兽进行区分。换言之，作家的伦理身份决定了他既有强调感性、审美的一面，又有注重理性、教诲的一面。恰恰在这个双重性问题上，出版人与作家有了不同的看法。

1865年12月，在给卡特科夫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仿佛有预感似的预先声明：“如果您打算刊登我的长篇小说，那么我非常恳切地请求《俄国导报》编辑部，别对我的小说做任何（楷体字为原文所有——引者注，下同）修改。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这么做”（陈燊 436）。作家在这里提到的长篇小说是《俄国导报》将于1866年第1期刊发的小说《罪与罚》。从该书的创作过程来看，两人就此发生了较为激烈的争论，争论焦点在于小说的第4部第4章。

在这里，拉斯柯尔尼科夫与索尼娅一起阅读《圣经》里“拉撒路复活”的场面令人难忘：“插在那个歪斜烛台上的残烛已快熄灭，暗淡地照着陋室里一个杀人犯和一个卖淫女，他们奇怪地凑在一起读这本永远的书”（陈燊 416）。作为拿破仑主义的信奉者，拉斯柯尔尼科夫向高利贷老太太挥起了斧子；索尼娅则因为要拯救家人走上了出卖肉体的道路。他们都属于毫无出路的社会底层，然而他们都渴望从“永远的书”——《圣经》中获得救赎。正如论者指出：“这是明暗交错和光线集中的伦勃朗式的画面，也是一个象征性场面”（彭克巽 157）。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用这一细节揭示：即使是再卑微的灵魂，内心也有着对真善美的向往。应该说，两百年来，这个场景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

不过，这一章节在编辑部里引起了困惑，陀学家格罗斯曼（Л.П.Гроссман, 1888-1965）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传》里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主编卡特科夫和执行编辑柳比莫夫（Н.А.Любимов, 1830-1897）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场景描写表示极为不满。他们认为“小说作者把一些社会垃圾看得比教会和最高当局的神圣法规还要高。他丧失了道德标准，陷入了虚无主义。（……）在这里，生活的光明面和阴暗面被完全混淆了。在这种杂乱无章中很难区分出什么是善良和理智，什么是恶习和罪孽。（……）编辑部建议作者彻底修改这段描写，在使用宗教和伦理概念时要立场鲜明，毫不含糊”（格罗斯曼 478-479）。可见，双方的根本分歧在于作家的伦理选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塑造人物的时候似乎较多地强调苦难与救赎，没有考虑到要从责任、义务和道德等价值方面对人的身份进行确认。与此同时，在卡特科夫及编辑部同仁看来，小说上述场景的描写在读者心里引起的只有同情心泛滥的快感，不能教导读者进行善恶的分辨，彰显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这显然不符合卡特科夫作为杂志主编的要求。针对上述意见，无奈的作家只得妥协，作了大量的删减。在1866年7月8日致柳比莫夫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再度表明：“恶和善最大限度地区分开了。无论如何已经不能再把它们混为一谈或者加以曲解了。同样，您所指出的其它一些要改动的地方我也都做了修改，并且似乎已超额完成”（陈燊 451）。作家在这里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区分“恶和善”的必要性，然而，作家的苦心似乎仍未得到卡特科夫及其编辑部的认同。

在稍后（1866年7月10-15日）给《俄国导报》另一位执行编辑米柳科夫（А.П.Милюков, 1816-1897）的信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详细介绍了冲突的结果：卡特科夫与柳比莫夫商定，借夏季大多数读者去度假之际，将作家已寄过去的四章拿掉一章发表，所删除的那一章就是男女主人公在灯下读圣经的情节。作家对此坦承：“我是在真正的灵感冲动下写就这一章的，可能，这是写得很糟糕的一章，但对他们来说问题并不在于文学价值，而是他们在为道德性担忧”（陈燊 454）。

所谓的“道德性”，即卡特科夫所犹豫的一个杀人犯、一个妓女能否承担起救世的重任？进一步讲，作家一方面大肆渲染拉斯柯尔尼科夫对上帝存在与否的怀疑，另一方面又安排一个身份卑微的妓女来承担救世主的使命，这里面是否包含着某种对宗教的大不敬，因而具有某种虚无主义的痕迹¹。

事实上，对于索尼娅这一文学人物的不同认定，本质上就是文学伦理学批评所强调的“伦理选择”问题。感人是人自然情感的流露，而道德则是人之理性的体现。文学作品就是通过对人如何进行自我选择的描写，解决人的身份问题。问题在于：文学在强调感人的同时，是否应该具有一定的社会道德担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位久负盛名的作家，有没有必要为了“文学价值”放纵自己的自然情感，肆意褒扬一个妓女和一个杀人犯？卡特科夫在

1 尤其是考虑到1866年4月发生的卡拉佐科夫刺杀沙皇事件这一背景。

这里的意见，实际上很好地体现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看法。即无论是批评还是创作，都必须承担一定的道德责任。作家固然有创作和虚构的自由，批评家也有批评和解释的自由，但这种自由需要受到社会道德准则的约束，总体上应该有益道德而不能有伤风化。这是卡特科夫作为杂志主编的伦理身份所作出的必然选择。

作家自然有选择情节、塑造人物的自由，但作为一家有影响的出版物，《俄国导报》本身也富有相应的道德使命。用格罗斯曼的话说就是：“两位反动教授处心积虑地想使整个作品的这一中心部分具有一种能为全社会所接受的合乎情理的面貌，而这显然是同天才艺术家按照自己的观点对古老神话中关于一个罪孽深重者复活的故事所作的极其深刻和富有独创性的解释相抵牾的”（格罗斯曼 481）。格罗斯曼作为苏联正统的陀学家，自然对卡特科夫这等保守派人士没有好感，因而称之为“反动教授”，不过他毕竟指出了卡特科夫所坚持的是“能为全社会所接受的合乎情理的面貌”，即作品的社会担当这一用意。

与格罗斯曼同时代的高尔基却与卡特科夫有着某种思想上的共鸣。高尔基早早地指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卡拉马佐夫习气”的危害性，甚至建议莫斯科艺术剧院不要上演《卡拉马佐夫兄弟》。究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固然有天才、感人的一面，但具体到当时的社会语境下，却有那么一些违背社会伦理秩序的成分在内。此外，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身后被称之为“残酷的天才”（米哈伊洛夫斯基语）或“病态的天才”¹（托马斯·曼语）即可看出，批评界对他的创作倾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持保留态度的。毕竟，天才艺术家因为自己过于超前的意识被社会所排斥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问题最终在柳比莫夫的协调下以双方各自退让而解决。不过，由于作家自己的修改，加上《俄国导报》编辑部的任意删减，我们今天已经很难了解小说第4部第4章的最初面貌。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说，这自然是文学史上的一大损失。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无法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的那些文字到底是如何不堪，以至于击破了卡特科夫的伦理观底线。

二、争论背后的伦理选择

陀学专家弗里德连杰尔（Г.М.Фридлендер, 1915-1995）曾指出：

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把两个为社会所遗弃的人——拉斯科尔尼科夫和索尼娅·马尔美拉多娃、‘杀人犯和妓女’——的命运置于小说的中心，是因为他们的命运使他得以把在他看来是伟大的、‘永恒的’人类道德

1 因为作家的病态，托马斯·曼才提出：“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恰如其分，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有明智的限度——这乃是口号。”参见 托马斯·曼：“评陀思妥耶夫斯基——应恰如其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斯人等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年）86。

问题与当代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激动人心的问题联结在一起（格·弗里德连杰尔 157）

然而，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什么是“当代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激动人心的问题”？换言之，作家眼里的现实和卡特科夫心目中的现实恐怕未必一致。在作家看来，农奴制改革后的俄罗斯充满着这种令人绝望的场面，走投无路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和索尼娅成为“当代英雄”。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一位贫穷的大学生，在小说中他经历了两次伦理选择。第一是受贫穷的影响，他选择了杀富济贫，成为凶手。其次，大学生这一身份又促使他在犯罪之后陷入深刻的思考，最终做出自首赎罪的抉择。索尼娅的选择较为简单，她出卖自己身体换取家人存活。她的单纯和牺牲精神也是促使拉斯科尔尼科夫进行再度选择的因素之一。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二次选择和索尼娅的单纯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然而从总的趋势来说，他们俩一个走向杀人，一个走向卖淫，成为被社会所抛弃的人，这是那个时代底层小人物无可奈何的命运。与此同时，选择这样的两位年轻人作为自己小说的主人公，本身也体现了作家的伦理选择，即他关注改革大潮中的弱势群体并希望为之发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论及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时曾指出：“（……）十九世纪全部艺术的基本思想（……）它的公式就是因受环境、世世代代的停滞、社会的偏见等不公正的重压而被毁了的人能得到新生。这一思想是为社会上受屈辱者和被所有人遗弃而毫无权利者伸张正义”（陈燊 502）。不过，“如果你长时间地盯着深渊，深渊也会盯着你”（尼采 90）。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苦难的过多关注，使其创作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某些消极面。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常常充斥着对犯罪的描写。用高尔基的话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是一个伟大的折磨者和具有病态良心的人——正是喜爱描写这种黑暗的、混乱的、讨厌的灵魂”（高尔基 179）。这一点，恰恰是卡特科夫极为反对的，于是他提出了“积极因素”以收对抗之效。所谓“积极因素”，在笔者看来就是强调伦理秩序、伦理身份等一系列社会道德法则的因素，这是卡特科夫伦理选择的主要目的。

在《关于进步的事》（1861）一文中，卡特科夫提出：“否定只有在和某种积极因素不可分割时才是生活的力量、成功的武器。我们对否定因素的渴望越是强烈，一切会成为牵扯或阻碍的东西就会消除地越彻底。只有当否定成为服务于生活的事业，它就只能服务于积极的目标。但为了否定而否定——毁灭和分裂——这是死亡而非生活的事”（*Катков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Деятели России* 8）。卡特科夫不是完全反对小说中对社会丑恶现实的描写，关键在于他认为这种描写必须要与积极因素，譬如最终的拯救结合起来。文学不能纯粹为了否定而否定。一部作品创作出来的目的往大了说不外乎弘扬真善美，批判假丑恶；往小了

说，就是抒发各式各样的情感。只有有益于读者身心健康的书，才能在最大范围内得到读者的认可和接受。卡特科夫的这一见解不无道理。事实上，即便少数是以“审丑”为目的的一些现代后现代作品，其最终目的也是试图在丑陋中寻得美，并非为丑而丑。相比之下，作家所赋予拉斯科尔尼科夫和索尼娅杀人犯和妓女的人物设定似乎既卑贱又伟大，感人固然有之，却也容易对读者造成伦理身份的困扰。以至于后来弗洛伊德说：“罪犯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几乎就是救世主，他自己承担了一定要被别人承担的罪责”（弗洛伊德 355）。这是一贯强调维护社会伦理秩序的卡特科夫所不能接受的。

从艺术塑造的角度来说，拉斯柯尔尼科夫和索尼娅这样身份卑贱的人物与福音书救赎这么崇高的理想放在一起，对读者来说更富有冲击力和感染力。正如格罗斯曼说的“（……）这一形象可以与古代那位心地善良并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女英雄安提戈涅媲美”（格罗斯曼 461）。如果仅仅安排一位身份普通的女子来取代索尼娅，那她的自我牺牲精神就无从体现。问题在于编辑部需要作品具有“一种能为全社会所接受的合乎情理的面貌”。所谓“合乎情理”，就是文学伦理学批评所说的“是某种道德意志和道德观念在文学评价中的体现，它往往超越了个人的情感而代表了某个集体的、时代的、民族的主要价值观念”（聂珍钊 103）。一位作家的创作是他个人的事情，但作品的发表却会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具有公共性。在19世纪中后期，整个欧洲社会的道德规范相对保守，即便最为开放的法国主流社会，对波德莱尔的诗歌及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也不能完全容忍，俄国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刊物对作品的倾向严格把关，以免误导读者。

卡特科夫对文学伦理选择的重视可以追溯到1855年——即《俄国导报》初创之时。彼时俄国正值多事之秋：克里米亚战争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尼古拉一世去世。卡特科夫在这一年的5、8月接连给教育部呈文，要求创办名为《俄国记事者》（*Русский Летописец*）的杂志（后更名为《俄国导报》）。他在呈文中说：“我们当今的局势让人想起1812年的伟大时期，但我们却没有一个类似于《欧洲导报》和《祖国之子》的杂志，这种杂志让人联系起爱国主义的回忆。如今一切头脑都忙于伟大的战争，上帝将帮我们祖国怀着永恒时期的荣耀那样走出这场战争。最好我们现今社会中占主流的崇高激情能在文学中找到独特的刊物加以表达”（*Катков Идеология охранительства* 14-15）。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主义是一个社会正常公民必备的情感。卡特科夫对爱国主义这一“现今社会中占主流的崇高激情”的强调，本质上也是出于维护社会正常伦理秩序的需要，因此对爱国主义的强调、对社会道德风气的维护成为他此后整个文学批评的基石，直接影响了他对文学目的性、文学家的使命等问题的看法。在《俄国导报》的纲领性文章《普希金》（1856）及稍后《关于进步的事》（1861）、《屠格涅夫的小说及其批评》（1862）等篇章中，文学伦理选择得到一再强调。

《普希金》一文虽以诗人命名，但在具体论述时却超越了这个范围。为了驳斥当时激进派文学批评对普希金的功利性利用，卡特科夫在一开始就谈到了文学的使命和诗人的职责：“文学就是对于社会本身及个人的认知”（*Катков Заслуга Пушкина: О литераторах и литературе* 246）。既然是“认知”，就不可避免地会有目的性：即认知什么，认知何为？这就涉及到文学的两大目的：审美和教诲。卡特科夫进而指出：“艺术应该有自己内在的目的，就像世间万物一样。这是一切组织，一切独立存在物，一切具有人的天性的活动所具有的普遍法则”（*Катков Заслуга Пушкина: О литераторах и литературе* 254）。但这个目标不应该是现实的、功利性的，它应该服务于真理。恰恰是真理而不是美构成了艺术的“第一也是必要的基础”（*Катков Заслуга Пушкина: О литераторах и литературе* 254）。教诲的真理要高于审美的美感，这是卡特科夫所秉持的一个原则。正如《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中所说：“就读者而言，审美就是文学教诲价值的发现和实现。审美并不是文学的功能，而是为文学的教诲功能服务的，是文学教诲功能实现的方法与途径”（聂珍钊 14）。事实上，卡特科夫的文学批评越到后来，就越是将这一思路贯彻到底。

在名为《为现代记事说几句话》（1861）一文中，卡特科夫公开宣称自己杂志的倾向变化：“我们并不拒绝作为文学警察的义务，我们会尽力帮助善良的人们去揭发那些放荡不羁的流浪汉和小偷。但我们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而是为了事业和荣誉”（*Катков Заслуга Пушкина: О литераторах и литературе* 313）。“文学警察”——这是卡特科夫对自身刊物的一个定位，在当时因为这一表述，外加卡特科夫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卡特科夫一度引起知识界的大肆批判，他作为官方走狗的名声也多半来自于此。然而不难发现，卡特科夫强调的是刊物成为社会舆论工具的责任。他曾宣称：“社会舆论在我们国家已成为无可争议的力量。它的影响遍及各处，到处都有都在发挥作用。刊物的力量也随之增长。尤其在我们国家，刊物已成为了宣告社会利益的几乎唯一喉舌”（*Катков И Леонтьев* 1）。可见，他的立场还是以文学伦理为依据，刊物首先要代表社会利益，确立惩恶扬善的使命，揭发的是“那些放荡不羁的流浪汉和小偷”，追求的是“事业和荣誉”。换句话说，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一份杂志要坚持立场鲜明，弘扬正气，树社会新风，似乎也没什么不对。

杂志如此，批评家更需要如此。在《屠格涅夫的小说及其批评》一开始，卡特科夫便指出了艺术家的使命所在：“艺术家的使命便在于直接作用于自己的时代，这一要求的真正内涵在于艺术家是时代之子、祖国公民”（*Катков Заслуга Пушкина: О литераторах и литературе* 459）。“诗人与公民”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俄罗斯文学界已经争论了许多年，涅克拉索夫那一句“你可以不做诗人/但是必须做一个公民”（涅克拉索夫 324）可谓脍炙人

口。在这一点上，卡特科夫倒是和诗人有着共同的认识。那么，在这样的要求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杀人犯和妓女大肆讴歌，用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家舍斯托夫（Лев Шестов, 1866-1938）的话说：“在整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在嫉妒罪犯的精神世界的伟大（……）”（列夫·舍斯托夫 98），即便是出于艺术的需要，恐怕也不再符合批评家的文学伦理批评原则了。

1881年1月2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2月2日的《莫斯科消息报》上很快刊登了卡特科夫的悼文《陀思妥耶夫斯基内心世界的特征》。虽然这是一篇篇幅不大的急就之作，但对于此前两人争论的创作道德性问题，卡特科夫终于有了一个迟到的总结：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在揭露，也不是“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他在自己的分析中寻找真理，走得越来越深入，直到尽头，什么也难不倒他，在遇到卑鄙无耻之前既不会感到也不会听到自己这颗病态的、跳动的、忘我的、渐渐安静的人类之心。”可见，批评家依然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态是“病态的”。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是真诚的。他怀着痛苦的灵魂在真诚地探索。这种探索的基础是卡特科夫坚决支持的，那就是俄国东正教。卡特科夫特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作家的贡献恰恰在于他以自身天才的全部真诚和全部力量在自己的民族情感中感受并获得高尚的真理——首先是我们所能感觉到的仁爱精神及基督教中宗教性最强的因素。这一真理存在于民族的最深处，它真正力量便隐藏于此”（*Катков Идеология охранительства* 677-678）。事实上，恰恰在这一点上批评家与作家取得了共识，因为批评家的文学伦理观也是源自于俄国东正教的价值观念。

三、卡特科夫的文学批评伦理观及其宗教基础

众所周知，19世纪俄国文学及文学批评历来被视为“为人生”¹的文学。由于受到沙皇统治下书刊检查等制度的约束，文学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舞文弄墨之举。赫尔岑指出：“凡是失去政治自由的人民，文学是唯一的讲坛，可以从这个讲坛上向公众诉说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赫尔岑 58）。在“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之中自然涉及到人的道德评价、伦理选择、教诲价值等要素，而这恰恰是文学伦理学批评涉及的主要方面。正如聂珍钊先生所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运用其批评术语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和阐释，尤其是对文学作品呈现的人物和事件进行伦理分析，挖掘人物和事件之中蕴藏的伦理价值以及道德倾向，揭示文学作品对于社会和读者的道德警示和教诲作用”（聂珍钊 9）。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别车杜还是卡特科夫的文字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一向较为注重别车杜等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们

1 诚如鲁迅指出：“俄国的文学，自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是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参见鲁迅：“《竖琴》前记”，《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587。

的著述，他们作为民众代言人，勇于揭露社会黑暗，追求公平和正义，成为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道德楷模，直到今天仍不失其现实意义。不过需要看到，别车杜等人的文学批评，其理论基础来自于西方的启蒙思想，他们在强调以西欧为典范的自由、民主和科学的同时也将西方的自由主义等思潮奉为圭臬，以至于在俄国社会形成了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及虚无主义的潮流。这种潮流发展到后来，就是宗教哲学家弗兰克（Франк С.Л., 1877-1950）所谓的“虚无主义的伦理学”¹。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俄国文坛还存在着另一种文学伦理观：即以东正教精神观念为基础，强调个人内心的救赎，弘扬俄罗斯民族的伦理观念，有学者不无依据地将这种文学伦理称之为“斯拉夫伦理价值观”²。正是这种传统的伦理价值观成为了俄国文学中反虚无主义文学思潮的理论基础，进而构成了与西欧启蒙价值观针锋相对的格局。甚至到21世纪之后，这种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得到了进一步的挖掘，成为今天普京政府推广“俄罗斯思想”的思想根源之一。

卡特科夫就是这种“斯拉夫伦理价值观”的主要代表及实践者³，这一观念的提出，主要以他对俄国东正教的信仰为基础。卡特科夫不仅是东正教的信徒，还是教会虔诚的一份子，他甚至在信中称神学院为“故乡的栖身之处，今后在斗争中，在低落的时刻我能够从那里寻求活力与增强力量”（*Перевалова* 74）。

这种对东正教的虔诚同样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文字及刊物上。正如当代俄罗斯研究者加弗利洛夫（Гаврилов И.В.）所说：“东正教主题是卡特科夫的新闻撰稿和出版物中的中心主题之一。其中很多材料都能证明东正教出版者深切的个人信仰以及持久的忠诚”（*Гаврилов* 209）。譬如在《俄罗斯的民族教会》（1867）一文里，卡特科夫就指出：“俄罗斯有国教。我们的教会之所以被称为俄罗斯国教，不是因为它享有国家特权，而是因为它起始于我们悠久历史的诞生之初，即我们国家的诞生之初。一旦我们记得自我，它就会在黑暗中闪耀，并在历史生活的所有沧桑变迁中陪伴着我们。它支持并拯救了我们；它渗透了我们存在的每一个角落，所有事物上都挂着它的印记。

1 参见 弗兰克：“虚无主义的伦理学——评俄国知识分子的道德世界观”，《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44-77。需要指出的是，别车杜的文学批评所体现的更多是一种伦理批评的思潮，而不是体系。

2 “追求斯拉夫伦理价值观既构成普希金创作的整体特征，也成为俄罗斯文学伦理基础之一，即强调个人依附共同体的集体主义，以斯拉夫为中心的本土主义，排斥个人智慧的非个人主义，带有感性色彩的非理性主义。这种斯拉夫伦理价值观在现代化运动中被提升为抵御西化的重要力量，进而成长为系统的斯拉夫主义伦理价值观。”参见 王树福：“十九至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伦理叙事的演变”，《外国文学动态研究》1（2020）：102。

3 在此之前的斯拉夫派自然也有相关的伦理价值观方面论述，但这些论述相对较为分散，不成体系，更多地可以视为一种思潮或萌芽。卡特科夫一方面有理论的论述，另一方面也通过刊物指导文学创作，来阐释了“斯拉夫伦理价值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堪称是俄国文学批评中伦理选择彰显较为明显也较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我们所有的记忆都和它联系在一起，所有的故事都是它书写的”（*Катков Идеология охранительства* 412）。这可以看作是卡特科夫对东正教的基本态度。他同时也以宗教的态度对待文学，认为它负有一种救赎的使命，具有超越个人本身的精神价值。可以说，东正教精神影响着卡特科夫文学批评观的形成和发展，对伦理选择、伦理秩序的建构等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卡特科夫还利用主编的权力广泛约稿，以小说、特写等形式广泛报道俄国人民的宗教生活，借此唤醒俄国社会对教堂以及精神和道德问题的关注。一方面，他不断地对文学的创作提出种种干预，《罪与罚》《群魔》以及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等都曾遭受过他的无情删减¹。另一方面，《俄国导报》也善于树立正面人物或道德模范。在此后陆续出版的一些古典文学名著里，都有对牧师，僧侣，长老等东正教人物正面性的描写²。相对于19世纪欧洲宗教因科学进步而节节败退，屡屡被视为“保守”“反动”之象征的大背景，卡特科夫如此坚持塑造宗教人士的正面形象，并非因为只有宗教界才有正面人物，而是看到了东正教作为当时社会的传统精神支柱，需要利用各种鲜活的文学形象来传播东正教思想，重新被赋予积极意义。

卡特科夫不但在报刊媒体上宣传东正教，而且还以各种实际行动推进东正教在社会中的传播，将之视为与西方思潮对抗的有力武器。从这个角度看，文学批评中的伦理学因素是他宗教思想发展的自然结晶。一百多年后，卡特科夫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后来人的肯定。莫斯科的阿尔捷米·弗拉基米洛夫大司祭（Протоиерей Артем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在纪念卡特科夫诞辰190周年的大会上指出：“我要把卡特科夫称为俄罗斯民族真正的教育者，因为他数十年来执掌《莫斯科消息报》，亲自撰文，确实培养出了民族的世界观”（*Владимиров* 9）。可以补充的是，卡特科夫的贡献不仅仅在于教育，也在于他批评观中强大的斯拉夫文学伦理观。批评影响创作，创作影响读者，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学界重新开始探索宗教哲学，反思古典，恐怕与此不无关联。

结语

作为《俄国导报》三十多年的主编，卡特科夫的文学批评伦理观最大的特点在于他以东正教观念为依托，与现实创作相结合，将他的这些因素尽数

1 譬如《群魔》中的《在吉洪那里》一章，因涉及到强暴幼女这种罪行被卡特科夫全部删除；《安娜·卡列宁娜》的结尾因涉及到托尔斯泰不赞成俄罗斯志愿者在保加利亚参战一事，卡特科夫便停止刊登小说的结尾。诸如此类之事颇多，体现了卡特科夫身为主编试图维护社会伦理秩序的努力。俄国文化研究者康托尔（В.Кантор）曾说：“卡特科夫是一位残酷的编辑，对于一切不符合他需要，他政治倾向的东西，他都亲手予以无情地删减或改写。”参见 См.Кантор В.М.Н.Катков и крушение эстетики либерализма.//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1973. №.5. С. 202-203.

2 例如《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佐西马长老和列斯科夫的长篇小说《大堂神父》里的那位祭司。

体现在对诸多文学家创作的干预当中,《罪与罚》只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例子。这种伦理选择既有对文学影响社会道德风气的考量,也有文学服务于家国利益的打算。究其实,卡特科夫的文学批评实践是文学批评伦理学教诲功能的最鲜明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时代总是在不断变化,社会道德伦理观念也越来越开放、宽容。曾经的《洛丽塔》现在成为了世界文学名著,更不用说《罪与罚》这样的展现社会苦难为主的作品。其中对杀人犯和妓女的歌颂已被广大读者理解为作家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展现,小说本身的经典意义也已完全得以确立。但文学批评要回到历史,还原现场,不能完全拿今天的标准去衡量近两个世纪前的古人,更不能借着社会开放、宽容的东风而否定一些基础的道德伦理观念。因为,一个正常的社会即便再开放,仍然需要一种基本的伦理秩序加以维系,卡特科夫文学批评伦理观的意义便在这里。另一方面,艺术永恒而社会总是不断发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道德风范,如何在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中保持初心,坚持道德底线,卡特科夫的文学批评实践或许可以值得我们参考。

Works Cited

- 陈桑主编:《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21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
[Chen Shen, ed. *Complete Works by Fyodor Dostoevsky*. vol. 21.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10.]
- 格·弗里德连杰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现实主义》,陆人豪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6年。
[Friedlander, George. *The Realism of Fyodor Dostoevsky's Fiction*. Trans. Lu Renhao. Hefei: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2006.]
- Гаврилов И.В. Михаил Никифорович Катков как охранитель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русских начал // Русско-Византий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 (2) (2019): 204-221.
[Gavrilov, Igor. "Mikhail Katkov as a guardian of Russian traditional origins." *Russko-Byzantsky Vestnik* 1(2)(2019): 204-221.]
- 高尔基:《论文学:续集》,冰夷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Gorky, Maxim. *On Literature (Continued)*. Trans. Bing Yi.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1979.]
- 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王健夫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
[Grosman. *Biography of Fyodor Dostoevsky*. Trans. Wang Jianfu. Beijing: Foreign Literature Press, 1987.]
- 赫尔岑:《赫尔岑论文学》,辛未艾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
[Herzen, Alexander. *Herzen on Literature*, Trans. Xin Weiwei.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62.]
- Катков М.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6 т. Т.1. Заслуга Пушкина: О литераторах и литературе. СПб.: ОО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осток"», 2010.
[Katkov, Mikhail. *Merit of Pushkin Alexander: About Literators and Literature*. vol.1. *Collected Works: In 6 Vols*. St. Petersburg: Росток, 2010.]

- .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6 т. Т.2.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Деятели России.* СПб.; ОО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осток”», 2011.
- [—. *Russian Conservatism: State Publicism Russian publicists. vol.2. Collected Works: In 6 Vols.* St. Petersburg: Росток, 2011.]
- . *Идеология охранительства.* М.: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09.
- [—. *The ideology of conservatism.* Moscow: Institute of Russian Civilisation, 2009.]
- . *Объяснение //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летопись* 27(1860): 145-167.
- [—. “Explanation.” *Modern Chronicle* 27 (1860): 145-167.]
- Катков М.Н. Леонтьев П.М. *Об издании «Московских ведомостей» в 1863 году//Современная летопись.* 43(1862): 3-8.
- [Katkov, Leontiev. “On the publication of <Moskovskie Vedomosti> in 1863.” *Modern Chronicle* 43 (1862): 3-8.]
- 涅克拉索夫: 《涅克拉索夫文集》(第1卷: 抒情诗), 魏荒弩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年。
- [Nekrasov: *Collected Works of Nekrasov (vol. 1: Lyric Poetry).* Trans. Wei Huangnu.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ress, 1992.]
- 尼采: 《善恶的彼岸》, 朱泱译。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1年。
- [Nietzsche, Friedrich. *The Other Side of Good and Evil.* Trans. Zhu Yang. Beijing: Unity Press, 2001.]
-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
-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彭克巽: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
- [Peng Kexun. *A Study of the Art of Dostoevsky's Novels.* Beijing: Peking UP, 2006.]
- Перевалова Е. В. Защита Православия в изданиях М. Н. Каткова: журнале «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 и газете «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 // Проблемы полиграфии и издательского дела. 4 (2016): 71-81.
- [Perevalova, Elena. “Protection of Orthodoxy in publications of Katkov Mikhail: magazine <Russky Vestnik> and newspaper <Moskovskie Vedomosti> .” *Problems of Printing and Publishin* 4 (2016): 71-81.]
- 列夫·舍斯托夫: 《悲剧的哲学: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 张杰译。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2年。
- [Shestov, Lev. *The Philosophy of Tragedy: Dostoevsky and Nietzsche.* Trans. Zhang Jie. Guilin: Lijiang Publishing House, 1992.]
- Протоиерей Артем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 Слово о Каткове.// Катковский вестник: религиозно-философские чтения : к 19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М. Н. Каткова: М.: Прогресс-Плеяда, 2008. 5-10.
- [Vladimirov, Artemy. “Word about Katkov.” *Katkovsky Vestnik: religious-philosophical readings: to the 190th anniversary of Katkov Mikhail.* Moscow: Progress-Pleyada, 2008. 5-10.]